

解放前夕衡阳罢工运动研究

——侧重理性选择和资源动员视角

刘文钊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州 510275)

[摘要] 有别于以往基于阶级斗争及利益冲突理论展开的罢工运动研究,文章从理性选择视角和资源动员视角出发,通过梳理文献资料,揭示解放前夕衡阳工人罢工的动态发展过程。研究表明,衡阳工人罢工运动的爆发并非简单基于阶级矛盾或利益冲突产生,而是基于对特定社会背景、组织、资源条件的考量,由工人群体经过理性选择做出最后决判而来。此外,在共产党人的号召和领导之下,罢工运动有了强大的组织力量和社会资源支撑,而正是这股强大的外在动力最终将罢工运动推向胜利。

[关键词] 衡阳工人罢工; 理性选择; 资源动员

[中图分类号] K2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4)06-0005-05

工人运动的兴起常与民族民主斗争紧密相连,不同时期的工运具有不同的外在表现形式。解放前夕,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全面爆发,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热情高涨。同期,衡阳先后爆发一系列反饥荒、反迫害罢工运动,在当地乃至全省引起极大反响。通过对比当时全国不同规模的罢工运动,不难看出,其发生机制、动员过程、组织形式均有诸多相似之处。可见,解放前夕工人运动的爆发可能具有相同的内在逻辑,将衡阳工人罢工运动作为典型案例进行研究,将有益于我国罢工运动研究的推进。

基于有限的文献资料,本文对1946年至1949年衡阳地区发生的罢工运动进行动态分析,以对当时的工运原貌进行部分还原。与此同时,本文尝试对以下问题进行回应:罢工运动的推进与历史背景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引发罢工运动的机制有哪些;罢工运动的组织动员过程如何展开。

一 罢工运动研究视角及理论框架

(一) 以往研究回顾

长期以来,罢工问题广受学界关注。理解罢工现象,最重要的是找到发生机制。从以往研究来看,社会学界主要从以下视角对罢工运动展开研究:

第一,阶级斗争视角。国内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的罢工运动的描述着墨较多,其中大部分研究作为党史内容展现,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早期罢

工运动的阶级意识唤醒者是中共党员。在这些罢工运动中,中共党员在工厂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阶级意识被唤醒,从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变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能够因此而自发组织起来与资本家抗争。另有研究提出,任何时候,斗争的开展以及组织和阶级意识的建立,都是工人阶级有组织化的前提^[1]。此外,有学者称,陈独秀在领导中国早期工人运动时,便提出向工人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按照现代产业工会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主张^[2]。

第二,利益冲突视角。当前,大多数罢工运动的发起源于经济利益纠纷。蔡禾对广东南海本田工人罢工展开研究,认为该次罢工标志着农民工的利益诉求从“底线型”利益向“增长型”利益转变^[3]。可见,蔡禾教授对于南海工人(农民工)罢工的研究是基于利益视角展开的。陈佩华更是通过对比中国珠三角地区和越南的罢工运动,挖掘了政府与官方工会关系、劳动法规及法律调整机制、三方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等深层信息,并由此指出,本田罢工事件很可能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标志着基于利益的工人抗争时代的到来^[4]。

综上所述,国内主流的罢工运动研究可概括为:经由罢工运动,工人阶级意识得以唤醒,工人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自发组织起来与资本家斗争;当前的罢工研究则淡化了阶级斗争这一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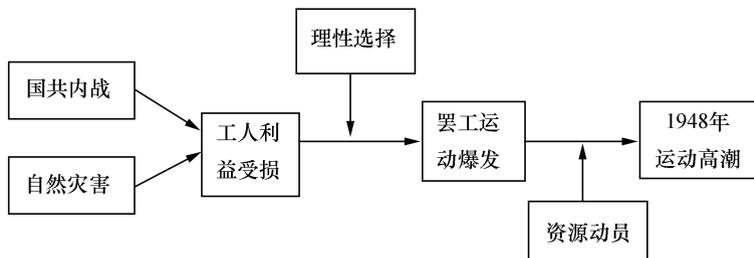
题,侧重于基于利益诉求的角度进行分析。由此可见,当前的罢工运动研究更倾向于静态机制的研究,而对于工人罢工运动过程的动态研究则关注较少。

(二) 本文研究视角及理论框架

罢工运动是社会运动的类型之一,罢工运动的爆发主要源于劳工利益矛盾。本文认为,罢工运动是工人经过利益权衡做出抗争决断,并通过社会资源动员过程而引发的社会运动,从理性选择和资源动员的视角对罢工运动展开研究将有益于对社会运动的动态把握。

1、理性选择视角

理性选择理论最为核心的观点是人以理性的行动满足自己的偏好,并使效用最大化^[5]。科尔曼认为,行动系统包括行动者、资源和利益等三个基本元素。他对“社会行动者”的定义借鉴了经济学的“具有目的性的理性人”的观点。科尔曼指出,每个行动者都有一定的利益偏好,并试图控制能满足自己利益的资源。“资源”是行动者采取行动的条件和保证,资源的类型有许多种:私人物品,事件和某些专长。行动者的“利益”是由一定的需要和偏好构成的,它包括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需要以及偏好。行动者与资源之间是控制关系与利益关系。“行动者只有一个行动原则: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利益。”^[6]



二 衡阳罢工运动中的理性选择和资源动员

1946—194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不断推进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民众的剥削和搜刮,加上先后遭遇两次饥荒,导致全国范围内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民不聊生。1946年4月27日,衡阳市铅印工人罢工,反对物价飞涨,要求加薪^{[10]56}。由此,解放前夕的衡阳工人罢工运动打响了第一枪。

(一) 罢工运动中的理性选择

罢工运动的行动主体为工人群体,工人通常期望通过罢工运动的方式达到利益诉求的目的。然而,面对利益受损的情况时,工人会依据个人标准对抗争成本和回报进行权衡,从而表现出迫切程度不同的利益诉求愿望。当工人个体或小部分群体利益

2、资源动员视角

资源动员理论的两个核心假设是:(1)社会运动活动并非自发的和无组织的;(2)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并非是非理性的^[7]。资源动员理论的代表人物麦卡锡和扎尔德提出,社会运动数量的增多并不是社会矛盾及民众相对剥夺感、怨恨感增加直接导致的结果,而是因为可供社会运动发起者和参与者利用的社会资源大大增加了^[8]。此外,蒂利提出的社会运动动员模型试图从解析过程的视角对集体行动的产生和发展提供普适性的理论模式。他认为,一个集体行动必然包含以下因素,即行动参与者的利益驱动、行动参与者的组织、集体行动的动员过程、推动和阻碍集体行动的力量、政治机会或威胁、集体行动群体的力量^[9]。

3、理论框架

依据理性选择和资源动员理论的研究视角,可大致勾勒解放前期衡阳工人罢工运动爆发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工人群体因经受饥荒和国民党当局的剥削压榨,积聚了极深的社会矛盾;在中共地下党和工人领袖的号召及带领下,衡阳工人罢工运动爆发。后期,基于社会各界人士的物力、财力支援及其他因素的推进,罢工运动于1948年达到高潮。据此,本文的研究框架如下:

受损时,事件的影响力和煽动性较小,大型的工人罢工运动常难以开展。若工人仅凭个体力量与雇主抗衡,其抗争成本极高且收效甚微。此时,出于自身利益得失的权衡,大部分工人不会采取单独行动争取利益,或索性放弃抗争;相反,若整个工人群体的利益受损时,事件的影响力和煽动性将极大,动员工人开展罢工运动的可能性相对较大。且此时,在群体抗争中,个体投入的成本和需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小,获取成功的可能性却要大很多。因此,当工人的共同利益受损,且抗争资源相对充足的情况下,工人更可能通过群体抗争的方式实现目标。由此,理性选择理论较好地解释了罢工运动的内在动力。

1944年6月23日拂晓,衡阳保卫战开始^{[10]54}。

同年8月8日,经过与日军血战47个昼夜,在弹尽粮绝、援军不到的情况下,军长方先觉不得不率队投降,衡阳沦陷。此时,衡阳地区的物资储备十分匮乏。然而,1945年8月日军投降、衡阳光复,一年后的1946年国民党就挑动内战。这对于早已千疮百孔的衡阳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国共内战的爆发致使衡阳地区的工人无法重新投入城市建设和生产,大批工人因失业流浪街头,生活艰难程度不言而喻。对于这一时期的衡阳工人而言,由于刚经历过衡阳保卫战,大多数工人仍处于休养生息的阶段,力量极为薄弱,仅靠工人自身力量几乎难以与国民党军队对抗,保持沉默以求生存,仍是工人心中最佳选择。

1944年5月开始,衡阳境内80天无雨^{[10]55}。1945年,衡阳再次遭遇全境大旱。据衡阳市志记载,“1945年,由春至夏而秋不雨,衡山因早颗粒无收,衡阳全县收成不及1/10。由于苦旱致使时疫流行,衡阳境内大量民众死于疫情和饥荒。”

而在衡阳地区经历大饥荒的同时,1945年9月12日,衡阳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成立。同年4月,境内饥荒严重。而1946年上半年,衡阳县政府和武装军警在全县各地挨家挨户强行搜刮军粮数万石。同样在1947年6月,衡阳爆发水灾,境内损失惨重。1948年下半年,诸多国民党党政机关和军队纷纷迁入衡阳,致使衡阳市人口畸形膨胀,物价一日三变,金圆券是“先天买包盐,第二天擦大便”^[11]。衡阳地区人民再次陷入深深的黑暗当中,工人的生活境遇十分艰难。

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46年暑假,谭新东受广州中山大学涂先求同志的派遣,回衡阳市建立地下联络点。此后,星星之火开始燎原。在中共党员的号召和领导之下,“衡阳专科以上学友会”、中共衡阳地下党、“新民主主义人士联合会”、“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等先进组织纷纷得以成立,衡阳罢工运动从此有了核心领导力量。与此同时,随着后方物力、财力的不断积聚,衡阳工人的罢工运动逐渐得以可能。由此,1946年4月27日,衡阳市铅印工人罢工,反对物价飞涨,要求加薪^{[10]56},解放前夕的衡阳工人罢工运动打响了第一枪。

由此可见,解放前夕的衡阳工人从最初的保持沉默以求生存到奋起反抗实际经历了理性选择的过程。自衡阳保卫战开始,工人整体的利益已受到很大程度的损害。但因当时的衡阳工人正处于战后休养生息阶段,工人自身力量相对薄弱,与实力雄厚的国民党军队抗衡实属以卵击石。在当时,沉默、隐忍是工人最佳的生存之道。而到1946年前后,工人最

初休养生息的愿景不但没有实现反而被置于更差的生存境遇。生产建设基本停滞、特大自然灾害加上国民党对民众的进一步压榨,工人几乎被逼到生存的绝境。此时的衡阳工人面临的只有两个选择:继续沉默或者奋起反抗。

也正是在衡阳工人选择奋起反抗之时,共产党人给予的力量支撑无疑让工人群体如久旱逢雨,有了新的生存希望。先进组织的创立、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号召、后方财力、物力的不断积聚无疑为工人运动的爆发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此时,本手无寸铁、力量薄弱的工人群体不但有了先进意识武装头脑,还拥有了大批共同奋战的“同盟军”和运动资源。在这样一场由共产党人领导、各方力量集结的工人运动中,工人本身需投入的成本和需要承担的风险已大大降低。由此,对于生存已变得愈发艰难的工人而言,奋起反抗是此时的最佳选择。到此,衡阳工人运动终于爆发。

不难想象,在遭遇巨大自然灾害的同时,受到国民党军队的进一步欺压,无疑触碰了工人群体乃至所有人民的底线。在面临饥荒、疾病和战乱的情况下,人们的利益诉求仅仅是生存。而当生存空间被最大化压缩以至殆尽的时候,但凡有一线生机,工人阶级必然奋起反击,以维护最后的生存机会。由此可见,衡阳工人罢工运动的爆发并非简单基于阶级矛盾或利益冲突产生,而是基于对特定社会背景、组织、资源条件的考量,由工人群体经过理性选择做出最后决判而来。

(二) 罢工运动中的资源动员

资源动员是罢工运动的关键环节,直接决定罢工运动的成败。在罢工运动中,工人之间的联结显得尤为重要。通过运动领袖的号召、组织动员等“煽动”环节,工人个体利益开始向集体利益转化,更多的个体将最终投身于集体抗争运动当中。与此同时,在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充足、社会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情况下,罢工运动主体才能免去后顾之忧,更好的投入抗争运动。此外,妥善的组织资源设置将有力推动罢工运动的开展。由此可见,资源动员过程为罢工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外在动力。

1947至1948年衡阳工人运动达到高潮,两年内,衡阳工人“三反”罢工运动次数高达11次。同样是面临自然灾害和国民党军队的迫害,且1946年旱灾的破坏程度还远超过1948年衡阳水灾,为何衡阳工人罢工运动的高潮不在1946年却在1948年前后呢?显然,若单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看,抗争主体的利益偏好已不足以解释这一问题,而资源动员理论

恰能做出合理解释。与此同时,通过对动员过程的分析,将从侧面反映当时工运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资料显示,1946年夏天,谭新东受派遣回到衡阳市,开始建立地下联络点。1946年夏,谭新东与几名思想先进人士共同发起组织“衡阳专科以上学友会”,通过义演、义卖、革命精神宣传等活动,“衡阳专科以上学友会”一面联络和发展非党积极分子,一面接触党政、新闻界人士,及时获取情报、积聚财力、物力资源并广泛联合有志之士的力量对抗国民党军。自此,中共地下党力量开始在衡阳地区萌芽且不断壮大。

1948年3月起,衡阳先后建立三支中共衡阳地下党组织,领导衡阳城乡人民与黑暗势力作斗争,并最终赢得各项斗争的巨大胜利。三支中共衡阳地下党组织分别在报社、印刷厂、铁路、邮局、电厂等机构中建立革命阵地、发展地下党团员,以此壮大势力。由此可见,中共力量是有计划的选择机构以渗入革命力量,从而最大效能的联结社会力量、团结群众。控制了铁路、公路局意味着控制交通;控制了报社、印刷厂、铅石厂、邮电局便意味着控制了信息传播媒介;控制了电厂、水厂则意味着控制了城市有序运作的能源。由此可见,中共地下党通过革命力量渗入,几乎掌握了衡阳市的所有重要的革命资源,这为工人罢工运动注入了最强大的推动力。

紧接着,1948年12月20日衡阳市印刷工人罢工,报纸停刊,持续半月^{[10]58}。1949年1月下旬,粤汉铁路工人罢工^{[10]58}。1949年2月2日,耒阳公路职工罢工。此后,衡阳工人罢工运动一直持续到1949年4月。最终,解放前夕的工人罢工运动浪潮以1949年4月9日的衡阳渡口管理所全体职工罢工运动的胜利画上句点。至此,长达3年的衡阳工人罢工运动已经历了意识萌芽——不断壮大——最终胜利的发展历程。而在整个罢工运动的开展过程中,理性选择和资源动员无疑贯穿始末,对罢工运动的胜利提供了内在动力和外在推力作用。

不难发现,中共党人的号召和领导在解放前夕的衡阳罢工运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但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亲自带领工人争取利益,在罢工运动遇到困难时,他们还大力鼓舞民众士气、不断修订罢工方案、坚定的领导工人奋起斗争。除此之外,地下党组织还创办地下刊物和工人夜校,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培养工人革命的骨干。刊物的创办使工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更为畅通,同时也保证了革命消息传播的及时性。夜校的教师基本都是地下党员,除向工人教授新文化知识外,还宣讲

解放战争的形势,教唱革命歌曲。通过这些宣传形式,消除了国民党在当地散播的各种谣言,从而安定人心。

在整个罢工运动开展过程中,罢工主体本身也实现了力量不断积蓄的过程。从1946年的工人只身奋起反抗到1948年罢工运动达到高潮,直至1949年罢工运动取得最终胜利,3年时间里实际也实现了由中共党人领导、多方获取财力、物力资源、逐步掌握交通、通讯、能源等革命资源命脉的能量持续过程。衡阳工人罢工运动到1948年迎来高潮,无疑是基于坚定不移的抗争意识、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形式、充足的革命资源储备之上而得以可能的。

由此可见,衡阳罢工运动背后有着强大的组织力量和社会资源的支撑,且松散的社会管理环境为罢工运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方面,作为核心领导力的中共党员有着最先进的革命意识,也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能科学地指导罢工运动实践,从而大力推动罢工运动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经由先进知识分子的大力号召,社会各界在财力、物力方面提供了大量供给;再者,处于抗战结束和国共内战初期的衡阳地方政府暂处于“管理无力”状态,社会管理环境相对松散。因此,在政府控制相对薄弱的时期,罢工运动的爆发以及顺利推进则少了许多现实障碍。

三 结论

罢工运动的开展实际经历了理性选择和资源动员两个重要过程。解放前夕的衡阳罢工运动的爆发源于内战和自然灾害带来的工人失业、克扣工资以及政府不作为带来的物价飞涨。此时衡阳工人的生存空间已被挤占殆尽,若一味的沉默隐忍,只会最终将自己送向死亡。由此,经由理性选择的过程,工人群众最终选择了以罢工运动的形式与国民党政府抗衡,以争取最后的生存机会。而在罢工运动中,社会精英的参与常给罢工运动带来甚好的抗争效果,资源供给的多少也直接影响罢工运动持续的时间长短以及成败与否。有了中共党员的领导,罢工运动便多了科学的组织形式,参加罢工运动的主体也有了先进意识来武装头脑。此外,社会各界给予的财力、物力供给为罢工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由此,随着领导组织的不断成熟、罢工主体力量的不断壮大、革命资源的不断积聚,衡阳工人运动迎来了运动高潮,并最终走向胜利。

而在整个罢工运动开展的过程中,共产党人是罢工运动的绝对核心力量,他们不但积极领导工人

奋起反抗,还不断在革命队伍中传播先进革命思想和科学知识,积极武装工人的头脑。在罢工运动受到阻碍时,共产党人更首当其冲带领工人继续斗争,不断鼓舞工人士气。可见,解放前夕的衡阳罢工运动的胜利离不开共产党人的支持。此外,在解放前夕的衡阳罢工运动中,许多当地商人、侨胞纷纷捐款、提供大量物资,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也广泛团结群众,不断壮大罢工队伍。再者,罢工运动的结果与当时的社会管理环境紧密相联,战乱致使当时的社会治理环境相对松散,从而罢工运动受到政府阻力则相对较小。

[参考文献]

- [1] [英]菲尔·赫斯.“自在”还是“自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瓦解了吗?[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10):139-142.
- [2] 谭献民,为实现无产阶级由“自在”向“有为”阶级的转变而奋斗——论一次劳大前后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内涵与意义[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7(5):63-67.

- [3] 蔡禾.从“底线型”利益到“增长型”利益——农民工利益诉求的转变与劳资关系秩序[J].开放时代,2010(9):37-45.
- [4] 陈佩华,刘建洲.中国出口工业区的罢工:比较的视野[J].开放时代,2013(2):156-175.
- [5] 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133.
- [6] [美]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37.
- [7] [美]莫里斯,等.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M].刘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2.
- [8] McCarthy, John Dand Mayer N Zald.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M]. Morristown, N J: General, 1970.
- [9] Tilly. C. Social Movements, 1768-2004, New York: LLC, 2004
- [10] 衡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衡阳市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 [11]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80年[M]//湖南图志衡阳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160.

The Research on Strikes of Workers in Hengyang on the Eve of Liberation

——Emphasis on rational choice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perspectives

LIU Wen-zhao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strikes action research based on class struggle and conflict of interest theory, this research emphasizes on rational choice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perspectives, and reveal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trike of workers in Hengyang based on sorting and analyzing related literature. The paper figures that the outbreak of strike is not simply based on class contradictions or interest conflicts, but a consideration of specific social background, organization and resource condition, and workers will finally make a decision to fight through rational choice process. Besides, with the call and leadership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strike got a strong support of organization power and social resource. And this strong external dynamics eventually propelled the strike to victory.

Key words: strikes of workers in Hengyang; rational choice; resource mobilization